

对女性主义的误解：中国网络媒介中“性别对立”现象的生成逻辑与演化路径

朱嘉琪^{1*}

(¹ 浙江传媒学院 电视与视听艺术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随着中国女性意识的持续觉醒，女性权益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关注，互联网的深度普及则为这一议题的传播提供了关键载体。整体来看，网络媒介使中国平权思想的传播与女性问题的解决呈现出向好态势，但仍存在显著挑战：一方面部分女性对女性问题的溯源存在偏差，部分男性固守传统男权思想，另一方面两性中均存在对女性主义内涵的错误理解，这使得男女之间的分歧逐渐演变为“性别对立”现象，且在网络媒介中表现尤为突出。通过聚焦当代年轻男女的典型观点及引发公众热议的网络媒介事件，并结合传播学理论视角进行分析可见，“性别对立”现象正呈现出扩大化趋势，其快速生成与持续扩散的内在逻辑值得深入探究。本文以“网络媒介语境下，‘性别对立’现象因何扩大”为核心研究问题，从现象生成逻辑与传播机制两方面展开分析，最终提出以“相互理解”为核心的化解路径。

关键词：网络媒介；“性别对立”现象；女性主义；生成逻辑；演化路径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6.v1i4.1085>

Misunderstandings of Feminism: The Generation Logic and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of the "Gender Antagonism" Phenomenon in Chinese Online Media

Zhu Jiaqi^{1*}

(¹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Zhejiang, School of Television and Audiovisual Arts,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China)

Abstract: As Chinese women's consciousness continues to awaken, issues concerning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have increasingly drawn social attention, while the profound popularization of the Internet has provided a crucial carrier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this topic. On the whole, online media has fostered a positive trend in the spread of egalitarian thought and the resolution of women's issues in China, yet significant challenges remain. On the one hand, some women hold biased views on the root causes of women's issues, and some men cling to traditional patriarchal mindsets; on the other hand, both genders harbor misunderstandings of the connotation of feminism. This has gradually turned disagreements between men and women into a phenomenon of "gender antagonism", which i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in online media. By focusing on the typical views of contemporary young men and women and online media events that have sparked heated public discussion, and analyzing them from the perspective

作者简介：朱嘉琪（2002-），男，广东东莞，本科，研究方向：新媒体艺术、互动媒介、文化传播

通讯作者：朱嘉琪，通讯邮箱：gaakei1221@163.com

ve of communication theorie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phenomenon of "gender antagonism" is expanding, and the internal logic behind its rapid emergence and continuous spread deserves in-depth exploration. Taking "why the phenomenon of 'gender antagonism' has intensified in the context of online media" as the core research ques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henomenon from two aspects: its generative logic and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and finally proposes solutions centered on "mutual understanding".

Keywords: Online Media; "Gender Antagonism" Phenomenon; Feminism; Generation Logic;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引言

Meg Tully 在其研究中提出“千禧一代女性主义(Millennial Feminism)”这一区分概念^[1], 这一作为在“第三次浪潮”女性主义基础上, 因数字时代特征更新而成的“第四次浪潮”女性主义, 其鲜明特质是借助网络社交媒体开展女性主义运动。互联网为女性提供了便捷的发声窗口, 成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利与地位的重要平台, 尤其为年轻女性及边缘化女性群体提供了现实场景中难以获得的表达工具^[2], 也因此成为女性主义传播的核心阵地之一。

但网络媒介的实践过程中, “性别对立”的矛盾也愈发凸显。典型案例如《脱口秀大会第三季》中, 脱口秀演员杨笠以幽默方式调侃男性的表演引发广泛共鸣, 衍生出贬义词“普信男”(指普通却自恋的男性)。这一词汇引发部分男性不满, 在网络上引发了一系列针对男女两性之间的对立与骂战, 其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今。因此, 杨笠也被一些媒体营销为“女权先锋”“女权斗士”, 被推上“性别对立”的舆论风口。更值得关注的是, 有关新闻事件的舆论有时会呈现出莫名的“性别对立”转向: “唐山打人事件”本是恶性伤人事件引发的“女性安全”议题讨论, 却有部分激进观点将施暴男性泛化为全体男性, 挑动女性对男性的普遍敌视; “广州地铁偷拍事件”则从权利侵犯上升到性别侵犯, 其本质是过激情绪的猜测引发的名誉侵权问题, 核心应是两性在类似场景中的维权与应对策略, 但最终演变为网络暴力, 讨论焦点偏移为部分男性的“性别反击”与女性对“猥琐男”的吐槽。

这些媒介事件共同昭示了“性别对立”已然成为显著的网络现象。“性别”“女权”等词汇沦为可随意张贴的“标签”, “女拳”“田园女权”等概念的出现则进一步导致女性正当诉求被误读与污名化, 成为扭曲事件本质、深化两性矛盾的催化剂。从表象来看, “性别对立”现象的发酵逃不脱无良媒体营销的推波助澜——它们截取、放大争议言论, 刻意挖掘具有争论性的事件并导向“性别对立”, 以此博取流量、牟取“女权财”。但深层来看, 无论是大范围的骂战还是小范围的争论, “性别对立”的生成与扩大绝非单一事件、媒体营销所能完全解释。

需要明确的是, “性别对立”是一种“年轻”的网络现象, 其形成与扩散仅历时十年左右, 这与女性主义在中国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形成鲜明张力: 为何女性主义长期追求的男女平等, 在网络时代反而催生出尖锐的“性别对立”? 网络固然为这一现象提供了传播土壤, 但网络表象之下, 必然存在更为深层的生成根源与扩散动力。基于此, 本文核心研究问题聚焦于网络媒介语境下, “性别对立”现象的生成逻辑及其持续扩大的演化路径, 以下将通过两个部分来分析。

1 误读与污名: “性别对立”现象的生成逻辑

“Feminism”自传入中国以来, 经历了多种中文译名, 其中直到现在仍被使用的只有“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 在主要使用上又经历了“女权主义”向“女性主义”的转变过程。张京媛认为, “Feminism”其实是“女权”(强调权利)与“女性”(强调性别)的结合, 但由于中文中并没有这样的复合词, 因此必须选择其一^[3]。事实上, “女性主义”“女权主义”只是

在同一词语实质上的不同理解。“女性主义”是对女性“性别”意义讨论，着重讨论女性的存在价值，强调女性光辉及自我意识成长等话题，希望通过女性力量消除男女不平等价值观，是女性诉求与身份的凝聚表达；“女权主义”则倾向于女性社会权益探讨，从探讨女性本身上升至社会政治层面，具有“人的解放”和“文明进步”的意味^[4]。

但在网络传播与现实演变中，这一概念逐渐被误读，进而产生污名化效应，成为“性别对立”生成的核心根源。这种误读与污名并非单一因素导致，而是多重逻辑交织的结果，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实际的演变中，“女权”一词被赋予了更多激进和仇男的负面意义。一方面，在中文语境下，“女权”二字容易被误解为“男权”的“镜像词”，由于 right 和 power 在中文中的表意文字有着相同的发音，其“权”的“权利(right)”表意常被误解为“权力(power)”。另一方面，用以批评女性主义者具有攻击性的谐音词“女拳”（发音与“Feminism”强调权利的译名“女权”相同）的出现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误解。随着网络转发讨论后断章取义式的发酵，“女拳”一词最终被部分人群用以称呼所有女性主义群体。女性的发声和活动，无论是否合理正当，都一律被称为“打拳”以表示一种贬义暴力行为。“女拳”一词的出现使“女权”进一步被污名化，不仅使部分男性对“女权”反感，部分女性也不敢提及。正如李英桃所说：“中国人一谈起性别问题，常常会声明‘我不是女权主义者’，好像自称女权主义者是丑陋的事。”^[5]

其次，“田园女权”成为女性主义被误解和污名化的又一典型征象。杜云飞认为“田园女权”有两大特征：一是发源于中国并具有本土化特征；二是囿于田园，具有只在口头上大张挞伐喊口号而不身体力行的空谈性特征^[6]。张冠男则认为“田园女权”是女性主义在中国被浪漫化或者说是异化的变种，意味着“田园女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权^[7]。“田园女权”实质上是一种“女利主义”，它要求社会男女平等，却要求男性承担主要责任；以为女性追求最大化福利为借口，享受着父权制社会所带来的红利，利己地蔑视男性、自诩特权等。然而，“女利”不过是父权思想的变体，违背女性主义的基本主张。父权之所以施予女性特权，目的不在于向女性示好，而是通过固化女性被关爱、被照料、被规训的客体特质，来实现自身在性别关系中的主导功能^[4]。

此外，另一个重要表征则是“反向凝视”。凝视理论指出了“观看”中的隐性权力结构：观看者具有以“看”来确定主体地位的特权，被观看者则在权力压力下，内化其价值观念进行自我规训^[8]。而约翰·伯格(John Berger)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男性凝视”，指出女性总是处于男性凝视下的第二性和被规训的客体地位^[9]。而与之对应的“女性凝视”也在其后应运而生，作为一种“对抗性观看”和“反向凝视”对占据凝视主体地位的“男性凝视”发起挑战^[10]。Altman Yuzhu Peng 在其文章中提出“女性化男性理想(Feminized Male Ideal)”概念，认为其在中国年轻女性群体当中愈发流行，表现为对男性“小鲜肉”形象的追求（亦即“男色审美”）。^[11]部分女性借由这种对男性完美形象的想象，通过“反向凝视”规训男性形象向女性所期望的“男性理想”转变。“女性凝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抵抗了“男性凝视”，但实质上与“男性凝视”在外貌、身材、职业、衣着、妆容等方面为女性提出规范的行为具有一致性，同样蕴含着一种不平等的权力结构。虽然不否认“反向凝视”存在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必须注意这一现象背后的极端女权风险。

女性对女性主义的“误读与污名”，使得部分女性错误走上了“女拳”和“田园女权”道路，也使部分女性羞于使用女性主义理论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而男性之所以对女权主义有着如此大的抗拒，表层原因是女性仇男现象的畏惧，深层原因是“女权”一词的不理解，本质在于对女性主义目标的不清晰和错误理解。男性对女性主义的误解和抗拒使得女性活动逐渐极端或走上错误道路，女性对女性主义的误解和误用以及“女拳”“田园女权”等词产生的污名化效果也使男性对女性主义产生恐惧和抗拒，两者间形成了相互影响的作用闭环，使得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遭遇了极大的阻力。“性别对立”现象之所以产生，其根源正是在于男女两性对女性主义本质的

误读和污名。

2 传播机制：“性别对立”现象的演化路径

“性别对立”现象的演化体现出了明显的舆论极化倾向。舆论极化，指的是同一议题争论无法达成一致，因而分裂出持有互斥观点的两个子群体，而少有持中立观点者。^[12]陈李伟、桂勇两位学者通过质性观察和数据分析发现，在网络女权激进化趋势的初期，扩权女权（其“典型主张是推翻男性主导的性别制度，建立女性主导的婚姻、生育制度”）由于其煽动性而更容易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种个别群体的极端化加剧了整体的群体分割，在同类聚集、信息茧房和流量竞争等机制的作用下，舆论话语也逐渐极端化。^[13]但两位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12—2018年之间，关注的对象主要集中在互联网高速发展初期刚刚诞生的女性主义讨论。而到如今，扩权女权在微博、小红书等主流社交平台日益盛行，发表极端言论攻击男性身份和行为，认为女性为“更优性别”，主张颠覆现有性别结构，建立所谓的“母权社会”。这些言论受到部分女性追捧，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扩权女权群体。而部分男性在极端言论下逐渐趋同形成“反女权”群体，并与扩权女权群体在网上形成对立，“性别对立”现象呈扩大化趋势。与此同时，群体分割也发生在男女双方群体内部，男性内部分化出“支持女权”和“反女权”两派，女性内部也产生了扩权女权、平权女权、工具女权等群体，男女双方群体内部也纷争不断，“性别对立”情势也愈发复杂。由此，可以发现“性别对立”相关舆论在这一过程中的极端化、扩张化与复杂化趋势。

接下来本文尝试溯源“性别对立”的传播路径，进一步总结“性别对立”现象扩大化的传播机制闭环：同类聚集—群体分割—极端趋向—“对立”环境形成—新的同类聚集。将这一过程详细而言，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初创期和变化期。首先，新世纪尤其是在2015年以来网络社交媒体高速发展和网民网络参与加深，与女性权益相关的网络媒介事件频频成为社会热点，一些网民注意到并开始对这些媒介事件发表意见。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话语区隔和互动区隔，使得不同群体具有了相对独立的特性，群体间的边界逐渐清晰，扩权女权、平权女权等各种群体开始出现。^[13]接着，“信息茧房”使得成员往往会基于个人偏好去选择信息，长此以往，就会将自身束缚于“茧房”之中。^[14]在数字时代，大数据加剧了这种个性化的选择，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更顽固的“茧房”。群体成员在这种情况下好似生活在“回音壁”之中，成员在群体内互动中发表观点，并得到同群体成员的相似回应，并在此过程中加深自己的想法，群体言论也更加趋于极端。

第二部分是环境形成期。在流量竞争机制下，扩权女权和“反女权”言论由于其煽动性，在网络中更容易占据可见地位和更多注意力而获取更多流量。然后，沉默的螺旋产生，更为平和的其他女权群体的观点逐渐被“优势言论”淹没，并经由在网络媒体中产生了以扩权女权和“反女权”言论占据优势地位的“拟态环境”^[15]。对立的“拟态环境”正式形成，“性别对立”现象扩大至一定阶段的顶点。最后，其他人群在互联网广泛的“性别对立”大环境中被浸润，并在“既有倾向”的影响下逐渐产生个人想法并据此加入不同群体，形成新的同类聚集。在这一过程中，前文所述这些被广泛讨论的网络媒介事件，就成为各群体在表达观点并“吸纳新成员”的“聚集地”，成为“性别对立”最外化的表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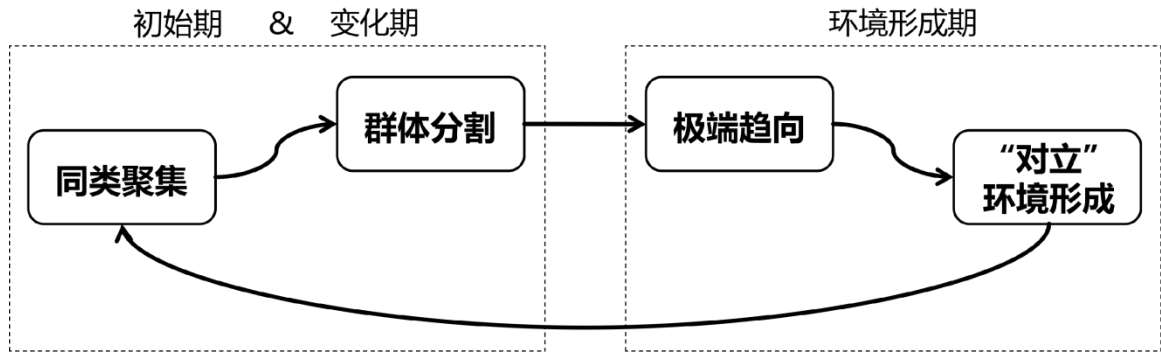


图1 “性别对立”现象扩大化的传播机制

3 相互理解：解决“性别对立”的必然路径

尽管我们认识到，女性依旧处于两性在社会事实上的劣势方，“男主外，女主内”的中国传统观念在今天依旧深入人心，女性仍旧是家庭事务的主力军，然而这些家庭事务所组成的家务劳动往往被社会所忽视。大众总是习惯性地关注主流男性从事的更显性的“主外”工作，而忽视那些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的非市场、非商品化的家务劳动。由于这些家务劳动不产生交换价值而只产生使用价值，不能以收入的形式呈现，因此父权制社会的关注更多会倾向于男性。^[16]这种现实中的性别不平等，虽然并非网络“性别对立”的直接诱因，但为相关议题的发酵提供了社会基础——一部分女性将现实中的不满情绪投射到网络空间，部分男性则对女性的诉求产生误解与抵触，最终催生对立。

但简单翻转同样是不可取的。电影《绝望主夫》塑造了一个男女颠倒的平行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男性是女性化的，女性是男性化的，相互之间调换了性格。男性负责相夫教子，女性则成为中国社会所要求的男性模样。这样的安排看似是想通过男女两性之间的调换，来引发男性对女性所承担的家庭责任的反思。但实质上，这种把“男尊女卑”变成“女尊男卑”的简单调换仅仅只是基于男女两性之间的刻板印象所产生的。在刻板印象当中，男性总是充当着“乘风破浪”的角色，更多处在商人、军人和消防员一类的具有开拓性的职业。与之相反，女性更多被要求承担家庭照料和养育子女等家庭责任。《绝望主夫》陷在了“刻板印象”的漩涡里，给男女两性进行“换汤不换药”皮相改变，看似是巧妙的喜剧手法，内里却是编剧狭隘的刻板印象在作祟。“女尊男卑”的设定无非就是“男尊女卑”在另一个世界的翻版，甚至强化了“尊卑有序”的父权制社会框定。

从某种程度上说，身处父权制社会下的男女两性遭受着同样的压迫，其中的重要表现就在于社会性别的建构。社会性别是由父权制社会为男女两性建构的性别特征，或者说是一种性别刻板印象，其“核心要义在于强调包括性别气质、性别角色分工等在内的一系列关乎男女两性差异的特征是社会建构的结果”。^[17]社会性别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如认为男性更理性而女性更感性、认为男性更具攻击性而女性更温柔、认为公领域是男性领地而私领域归于女性，其“直接后果是：使人们误以为某种性别就必须是某种样子的”。^[18]社会性别看似“波澜不惊”，但往往是以一种无声的方式影响着身处这一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可以说“性别对立”现象正是在社会性别中展开的。本文在第二部分提出，“误读与污名”是“性别对立”现象的根源。而社会性别本身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虽然并不直接导致“误读与污名”，但是在社会性别规范的深刻影响下，个体在认知、理解和传播女性主义理念时，容易陷入刻板印象和二元对立的思维陷阱，从而催生了对女性主义的误读与污名。换言之，社会性别并不导致“性别对立”现象，但在人们关注社会性别这一过程中所引发的“误读与污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性别对立”现象的产生。可以说，社会

性别作为父权制社会规训全体社会成员的手段之一，限制了男女两性选择自由发展的权利，将人们框定在了固定的发展范围之中，对于男女两性来说都是一种无差别压迫。

尽管“性别对立”现象已经产生并且正处在持续扩大的过程中，但其中的焦点——女性主义理论并不是“面目可憎”的概念。李银河在《女性主义》一书中写下的“女性主义的理论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在全人类实现男女平等”一言^[19]，显著概括了女性主义的本质目标——男女平等。实现男女平等，对于男女两性来说都是有利的。女性主义的目标正是对父权制的挑战，而这种挑战在解放女性的同时也解放了男性。因此，在面对“性别对立”这一问题上，男女两性理应是同盟者而非对立者。

而男女两性的相互理解，正是解决“性别对立”问题、实现“性别平权”这一目标的必然路径。首先，男女两性需要认识到社会性别及其下的父权制社会的深远影响。其次，男女两性也需要正确理解所谓女性主义理论的思想内涵。最后，男女两性更需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将心比心地思考对方的需求，尝试理解对方的言论和行为。也唯有通过相互理解，“性别对立”问题才能根本解决。而在这一“相互理解”的过程中，除了男性和女性作为双方群体要做出努力，主流媒体的正面引导、对于过激言论甚至网络暴力言论的法律完善与行政管控、学校尤其是中小学校的相关教育的完善等等因素同样也是需要发挥重要作用的。

4 结语

总结来说，网络媒介时代的性别议题讨论，本应是女性意识觉醒到平权理念传播再到男女两性携手共进的重要契机，却在概念误读、话语污名、流量裹挟与群体极化的多重作用下，异化为愈演愈烈的“性别对立”现象。从男性视角的“女权”被曲解为“女拳”，到“田园女权”对女性主义的负面传播，再到极端言论借“反向凝视”制造新的权力不平等，两性对女性主义核心内涵的认知偏差，成为对立生成的深层根源；而同类聚集、信息茧房、沉默的螺旋与流量竞争构成的传播闭环，则不断推动对立舆论扩大化，让理性对话逐渐被极端情绪取代。

事实上，女性主义的本质从来不是性别对抗，而是以男女平等为核心，打破父权制对两性的双重束缚，既解放身处于结构低端的女性，也解放被规训的男性。身处同一社会结构之中，两性并非天然的对立面，而是追求公平正义、实现个体自由发展的同盟者。消解网络性别对立，既需要两性跳出二元对立思维，正视彼此的现实困境与合理诉求，回归相互理解的理性轨道；也离不开主流媒体的正向引导、法律对网络暴力与极端言论的约束，以及教育层面对性别平等理念的普及。

参考文献：

- [1] Tully M. Constructing a feminist icon through erotic friend fiction: millennial feminism on Bob's Burgers[J].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2018, 35(2): 194-207.
- [2] Wang H. Chinese Women's Reproductive Justice and Social Media[J].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21, 30(3): 285-297.
- [3] 张京媛.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04.
- [4] 姚溪, 向天渊. 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田园女权”——“Feminism”中文译名的百年演变与衍生[J]. *重庆社会科学*, 2021, (03): 117-128.
- [5] 伍勤. 音量刺耳是应对装聋作哑的[N]. *新京报*, 2015-03-09(B02).
- [6] 杜云飞. 大传媒时代下的无疆野马：“中华田园女权”解读[J]. *创作评谭*, 2017, (3): 30-33.
- [7] 张冠男. 中华田园女权词意考：网络环境传播中女性权利的污名化[J]. *新媒体研究*, 2018, (5): 99-101.
- [8] 黄凯鑫. “凝视”理论下我国男性选秀类节目的话语研究[D]. 南宁: 广西民族大学, 2021: 5-6.

- [9] 陆绍阳, 杨欣茹. 俯视手掌的权力:重回男性凝视的网红直播视频[J]. 新闻爱好者, 2017, (02): 53-55.
- [10] 杨祎. 女性凝视与反凝视视域下《听见她说》中的女性主体性分析[J].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22, 37(03): 82-86.
- [11] Altman Yuzhu Peng. Neoliberal feminism, gender relations, and a feminized male ideal in China: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Mimeng's WeChat post[J]. Feminist Media Studies, 2021, 21(1): 115-131.
- [12] 白云, 李白杨, 毛进, 等. 舆论场观点极化现象研究:成因、识别与应对策略[J]. 图书情报知识, 2022, 39(06): 89-100.
- [13] 陈李伟, 桂勇. 互联网会带来激进化吗?——基于网络女权议题的网络动力学研究[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3, 45(04): 77-87.
- [14] 朱红涛, 李姝熹. 信息茧房研究综述[J]. 图书情报工作, 2021, 65(18): 141-149.
- [15] 周葆华. 算法、可见性与注意力分配: 智能时代舆论基础逻辑的历史转换[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43(01): 143-152.
- [16] [日]上野千鹤子.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M]. 邹韵, 薛梅, 译. 浙江: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 24-27.
- [17] 吴利娟. 社会性别:社会工作介入的重要视角[J].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2017, (01): 1-18+208.
- [18] 李银河. 性别刻板印象是对男女的双重压迫[EB/OL]. (2020-09-02)[2023-10-20].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967488.
- [19] 李银河. 女权主义[M].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8: 02.